

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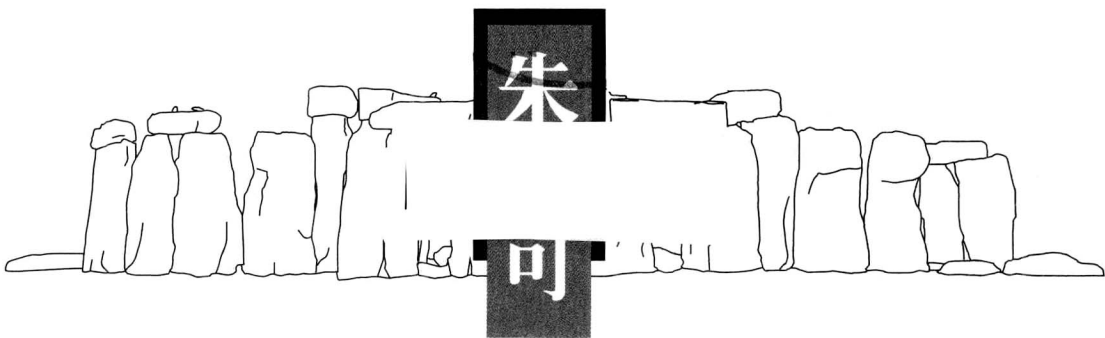
朱大可带我们
重温那个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巅峰



東方出版社

先知

朱大可帶我們
重溫那個文學與文學批評的巔峰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知 / 朱大可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7 -5060 -5915 -2

I. ①先…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2654 号

先知
(XIANZHI)

作 者: 朱大可

责任编辑: 黄晓玉 史 亮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0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7 -5060 -5915 -2

定 价: 36.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57 6521006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04

上篇 聒噪与倾听

003 \ 甜蜜的行旅

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035 \ 都市的老鼠

市民主义诞生于衰退的心灵和人格。这些心灵或人格,丧失了存在的激情和勇气,浑噩麻木地在世,为货币和一切被货币定义过的物品奋斗终生。

051 \ 无边的聒噪

面对人的广泛的荒谬和无力的境况,也即面对所有操作都丧失意义的状态,舌头竟然成为唯一有效的器官,舌头和它的产业(话语)不断运动着,使我们能够在孤寂中聆听到来自自身的声音。

069 \ 空心的文学

诗人和小说家像几百年前那样,固定在一个偶像的坐姿上。巨大的典籍庄严静穆,凜然披挂着圣洁的尘土。澄明之风吹来,一切便杳然无形……



中篇 燃烧与迷津

097 \ 燃烧的迷津

我所面对的文化(无论它是种族的还是世界的)充满着对诗歌的各种误解。诗并不像人们确信的那么重要,它不是什么“种族的触角”。

125 \ 缅怀浪漫主义

在最古老的年代,一个浪漫主义者就是一个真理的颂扬者,他越过无数的山峦和部落,把消息传递给所有沉浸在痴愚的笑意中的人群。而后,我们看到了一次巨大的骚乱和觉醒。

141 \ 先知之门

“诸神之夜何其黑暗啊!”海子如是说。

“午夜,我重是黑暗,重是万象。”骆一禾如是说。

167 \ 死亡的寓言

死亡解救了默默无闻的诗歌,使它突然被公众惊悚的目光所照亮,从而以悲痛的面貌引出了一种希望。

下篇 焦灼与渴望

179 \ 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

焦灼意识是整个焦灼期的主导意识、城市病的典型反应,它当然导源于严重的城市工业化异化、性压抑以及行为无力性等。

201 \ 慵懒的自由

睡眠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懒惰。睡眠时拒绝行动,是对未来的恐惧,或者,它是对自身境遇的一种厌倦和报复。

213 \ 饥馑的诗歌

被“饥饿”久困的人想象着他的“食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断续地说出真诚的渴望。

229 \ 诗神的迷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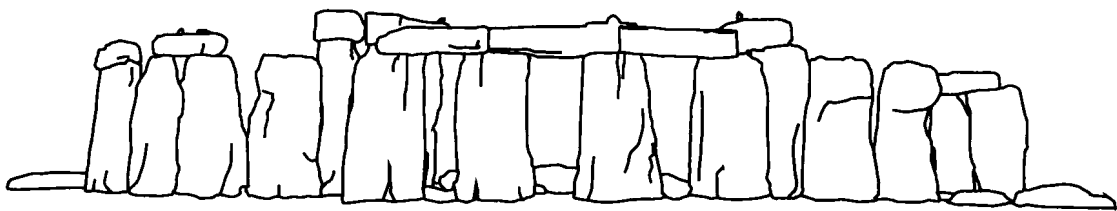
几乎所有的诗人都自称是天体运动的领袖或先锋,孱弱的诗篇戴上强悍的形而上面具向邻人发出恫吓,其“派”能否在诗坛鹤立,取决于那些骄傲而可爱的小鸟儿,能否找到羽翼的荫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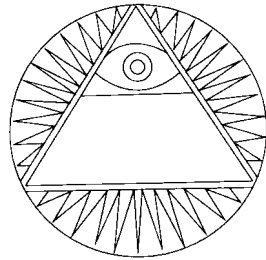
237 \ 破坏仪式的诗歌

诗歌,一种意识形态的幽灵,游荡在汉语的广阔荒原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喊。在现今的时代,面对演艺化的大众狂欢,没有任何家园能够收容这种“细小而柔弱”的事物。

247 \ 跋

上篇
聒噪与倾听





甜蜜的行旅

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如果我没有弄错，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的后文化时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以下简称“汪诗”）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不合时宜的旧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历史的必然。海子的诗歌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而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汪诗在市场上茁壮发育，后者表达了后文化时代的“易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征：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费的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汪诗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而在90年代末，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及王小波的作品（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经融入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

余秋雨的散文（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中港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中国台湾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性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来。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绝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性之中：在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里，《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后文化时代的特征是：精英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洪流所吞没。只有少数人继续浮在水面。他们是市场的先锋，犀利地



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并且利用这点对大众进行反操纵。他们通常受雇于国际（或区域）资本，借其专业特长为世界大亨效力，同时也利用国际资本实现其个人的文化野心。

我要援引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麦隆与国际传媒大亨梅铎的关系来表明这点。一个老套的好莱坞言情故事，在近似疯狂的高额制作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回响。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画家陈逸飞和美国犹太大亨哈默的关系。它们证明精英的信念早已过时。这个世界需要的绝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不再向民众提供思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模式。

改变精英命运的另一个动力是资讯的全球化。就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由于OCR技术（即对扫描的图像文件可以进行自由编辑）的发明，网络文字输入的困难已经消散，平面图书资源的利用变得轻而易举，网络杂志、文化专题网以及个人网页大规模涌现，网络文字总量（NET WORDS）在迅速增值，并为个人文化及区域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个人电脑对于外部消息的筛选标准与消息的来源（是否出自精英）完全无关，它吁请着所有满足欲望的“小道新闻”。由于数码网络的全球化，任何一个无聊的私密事件都有可能在一个瞬间里成为国际通报。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利用这一资讯网络的先锋，尽管未能改变克林顿的政治命运，但他却纠正了国际互联网络的附庸地位。“数码文化”已经实现了其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推翻。

市场及资讯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市场与资讯化，这个双向和双重的过程，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老式艺术家正在走向衰亡，而新的文化制造工业已经发育完备：专栏撰稿人和网络作家取代了正统作家，传媒记者取代了职业批评家，行画手取代了画家，摇滚歌手取代了歌唱家，制片人取代了导演，等等。总之，文化白领取代了知识分子。在取媚大众和营造票房纪录方



面，后者才是真正的主宰。

“媚俗”曾经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术语，用来描述艺术家的从众主义立场，并且注定要遭到道德化的抨击。但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

“媚俗”的合理性正是这样被确认的，它吁请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妥协和蜕变。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当推王朔、崔健和苏童等。他们在进行文化的包装和推销方面，显示了某种天生的丽质：一方面反叛传统意识形态，一方面向群众大肆献媚。市场原则被严肃地建立了起来。

这是20世纪80年代艺术家走向市场化的先锋。而在他们背后，成千上万的文化推销员在90年代期间茁壮成长。这一蜕变，受到了出版界、影视界和演艺界“资本势力”的有力支持。而其结果是，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诸如“独立制片人”、“自由撰稿人”的“文化中产阶级”圈子，除了隶属于大众和金钱之外，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独立。这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个重要景观。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恰恰相反，正是市场交换策略避免了文化的最后崩溃。或者说，它维系了文化和大众的基本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不屈不挠的战争之后，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背景中，文人向大众趣味和资本势力妥协与合作的时刻终于降临。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所作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文化（历史）的市场推销方面，他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



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在这期间，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愤愤不平的声音，似乎这种成功本身成为余的一个罪证：“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愤怒的十字架竖立起来了，痛苦的战士手执锤子和铁钉，要在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审判余文，吁请它的退出。余对此深感不平，1998年他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连续发表短文，以一个权威人士的身份进行话语自卫。对批评的轻蔑和痛心跃然纸上。

这是一种好莱坞式的戏剧性景象：一方面作家在重构与大众的文本蜜月，一方面批评家在不停顿地控诉这种努力。在这场诉讼中显然只有一个裁决者，那就是大众。这个价值陪审团将运用市场原则，对这个作家的“生死”（用港台流行的术语说，就是“走红”还是“过气”）作出终极判决，而这一判决的结果已不言而喻。

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

为了在阅读者那里引起必要的市场价值回响，选择恰当的话语策略，已经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言说者的一项基本技巧。这种策略包括：第一，确立具备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这个过程是内在的）；第二，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历史情结）母题；第三，寻找大众热爱的故事或（事件与人物）模式；第四，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等等。几乎没有任何当代畅销作品能够逾越这个市场策略框架。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书写者所采用的话语策略。基本母题是经过历史鉴定而永垂不朽的，那就是一种



浸透着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一母题的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王道士》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这个道士以他的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书写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

（在王道士用石灰粉刷壁画和按一个农民的趣味“修改”雕塑之后）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说，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朱案：“跪下”这个词用得耐人寻味），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踏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

“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



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它既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书写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审视余文的基本母题，从往事怀旧（对家乡、童年、老师、故人的缅怀）、历史文人和王朝（官吏）的恩怨关系，到百姓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著名的风物掌故、地理，均已包含煽情的内在语法。文人的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和爱国胸怀，最终都汇入了大众的价值关怀的博大江河。迷离的历史在这里被现实化和通俗化了，或者说，封闭的历史在新的诠释下重新向大众开放。经过情感包装的技术处理，最终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商品。

这种情形在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已经有过相似的先例。除了柏杨撰写的《中国通史》，还有一些古代典籍的现代诠释版，以及各种通俗的古代思想的简体字版或漫画版等。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市场化的策略还不够彻底，因为它们仍然存在着某种阅读障碍。一个纯粹理性的历史文本，无论怎样利用现代大众话语，均难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只有余文和少数几种文本击碎了这最后的壁垒。只有他成功地利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受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而最终，所有这些破碎的历史掌故的花瓣，均温柔地漂浮在民族主义的池沼之中，编织成了汪诗式的诗意图景。那么，在一个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特区有所例外）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即便如此，据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记载，仍然有